

纪 念
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论文汇集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编印

1983. 3. 14.

前 言

今年的三月十四日，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

伟大的马克思，倾其毕生精力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和实践。他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并肩战斗，创立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体系，它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永存的神话，指引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道路，是永远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性的运动，并在和具体情况相联系的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突破了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使无产阶级革命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包括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革命学说，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挡全人类在它指引下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撰写了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体会和学术论文。现选择其中的十五篇，编成这本纪念论文汇集，借以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互相切磋，以促进我们共同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理论素质和科学文化修养，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更好地为实现党政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服务，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3. 3. 14.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论文汇集

目 录

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徐澄清 黄树勋 (1)
国家、专政、民主、法制拾遗	范希夷 (10)
略论历史发展的顺序性与直接性问题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李润生 (28)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四章的体会	张菊兰 (37)
试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和伟大胜利	关桂霞 (44)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王允立 (57)
试论现代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	李斌华 (65)
•	•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不可战胜的	王立青 (74)
•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	俞金顺 (83)
剩余劳动的创造是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核心 -----	于靖扬 俞金顺 汪承基 (93)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总体系列性与综合平衡 ——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体会	汪承基 于靖扬 (99)

浅析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	
——学习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理论	江再杰 (109)
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及其在中国的胜利	李耕砚 (117)
实现民族平等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	徐立奎 (127)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王振海 (136)

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先进入 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徐澄清 黄树勋

今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去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帮助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走上了解放自己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当年马克思的科学预见正在逐步地变为现实。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个最伟大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4页）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任务就来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来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仅使这一科学的理论一再地得到了证实，而且还把它大大地向前推进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许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经验，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然而，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事实，却使有些人迷惑不解，以为这同马克思所阐明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相抵牾，从而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牢固地确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习惯于头足倒立地观察人类社会，把人类的全部历史仅仅看成是某种观念的逐步实现。直到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才把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历史观中驱逐出去，从而揭开了遮盖在历史身上的神秘面纱。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材料的研究，发现人类的历史并不是某种观念的发展史，而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

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改变，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第1卷第218页）这一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人类对于自己历史的考察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这一科学原理，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指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愈来愈高，最终必将撑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外壳”，从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毁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而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无产阶级，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这样，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发现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现实的物质力量。从而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人们头脑里的空想，而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现实。

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虽然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死亡；但马克思本人却并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唯一原因。在他看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只能从历史流程的总体上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可能向我们标明人类历史在各种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进程。更不可能向我们具体地标明资本主义的堡垒将从哪里开始倒塌，建造社会主义的大厦将从哪里破土动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规律的逻辑引伸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必然性毕竟不能代替现实性，在必然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还将受着社会中各种现存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其中包括各种偶然事变的作用，从而使规律的实现不是走着一条直线，而是要经历若干曲折，从而使资本主义灭亡的实际过程，也必然比一般规律所作的陈述要复杂得多。恩格斯后来在澄清某些青年人对这条规律所产生的误解时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着重点是笔者加的）由此可见，目前国内有的同志单纯从概念出发，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逻辑地推导出生产力越是发达的国家，越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突破口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基地，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就注定不能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格，这实际上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把一个本来十分复杂的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绝对化了。

自从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已经向资本主义制度发起过多次冲击，进攻重心，因不同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而发生过多变化。十九世纪初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英国。这不仅是由于当时英国在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中经济发展程度最高，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如马克思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大不列颠

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66年版第4卷第303页）。而且还由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具备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奋斗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等优点，从而使“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解放的伟大运动”（同上第304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对于英国的工人运动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人运动却沉寂下来。究其原因，倒不是因为英国的生产发展水平落伍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在经济上的霸主地位，使资产阶级可以从世界殖民地掠夺的财富中分出一部分来软化和分裂工人队伍。因此，到了五十年代末期，恩格斯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马克思也多次指出：“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明显地腐蚀，我们还要等着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0、第4卷第348页）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固然可以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工人运动的发展准备条件；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阻碍这一运动开展的不利因素。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始终都与革命的发展成正比的。

英国工人运动的衰落，曾使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沉静一时。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大大激化了法、德两国的社会矛盾，无产阶级革命时机重新到来，斗争的重心也由英国转移到法国，随后又转移到德国。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就预言：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恩格斯后来把这个思想概括为“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4页）这个预言，很快由于巴黎公社革命的兴起得到了证明。法国和德国先后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先地位，并不是法国、德国的生产力比英国更为先进，而是由于战争使法、德两国成为当时各种矛盾的焦点。巴黎公社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相对强大和初期工人运动固有的弱点而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成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的最初尝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地一般还着眼在资本主义发展较充分的国家，但他们也并不排除落后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特别是他们的晚年，已经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俄国。

俄国在十九世纪末，还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分微弱，广大农村还保留着原始的农村公社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俄国社会状况细密地研究之后认为，经济落后，并不是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障碍。马克思指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因为它又是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同一个时代，从而“使俄国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445—436页）一八八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很早就一般地预见到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过他们当时认为，这些国家的革命只有和发达国家的革命融为一体，共同奋斗才有胜利的希望，尚未作出资本主义防线可以在俄国首先被突破，更没有提出经济落后的国家可能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预见。这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作出这种预见的客观条件尚未出现。但是，历史进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条件终于出现了。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勇敢地面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新的回答。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作出正确回答的是列宁。列宁在详尽、周密地研究了当时资本主义新的发展趋势之后，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他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出发，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冲破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取得胜利。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在十九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列宁选集》第3卷第434页）在列宁的领导和具体组织下，俄国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但是这个胜利毕竟还是在一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内所取得的胜利，而且这一胜利也并没有如预期那样立即在资本主义文明国家引起连锁反应，相反，倒是在某些落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那末，落后国家，甚至象殖民地的中国能不能先进入社会主义呢？毛泽东同志根据世界和中国的具体特殊条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并在实践上实现了这一转变，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

纵观世界现代史，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成为垄断的帝国主义之后，伴随这一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转向经济落后的国家。继俄国突破资本主义防线以后，中国及一批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又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西欧、北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却反而相对消沉了，甚至到今天还看不到直接革命的形势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反常？是不是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为什么落后国家能先于发达国家进入新的社会形态？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变化。

当代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存在，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观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是出现于单个国家，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资本主义经济的触角

逐步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并进而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这种经济渗透把世界上处于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联接起来，统统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旋涡。还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恩格斯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紧紧地联系”还主要是表现为各“文明国家”之间；那末，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早已超越这些国家而扩大到了全球范围，而且这种联系也逐步从商品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跨越国度，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也必须超越国界，从世界范围内来加以把握。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使得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了过去单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未曾有过的新变化。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各国资本的积累主要还是依靠本国的条件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也主要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本土上进行。当时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多是依靠输出商品，很少进行资本输出，尚未在生产上把殖民地囊括于自己的经济结构之中。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着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生产上逐步向落后国家延伸，直接控制了落后国家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把落后国家的经济纳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轨道；而落后国家也愈来愈深地被卷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在生产上愈来愈多地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制成品和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沦为发达国家的“卫星国”。这时，资本主义经济已成为一个跨国度的庞大系统。发达国家处于这个系统的中心，它的周围环绕着大小不同的“卫星”，有如一个联系紧密的恒星系。由中心伸向各个“卫星国”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就象人体上的一根根血管，把“卫星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心地区，造成了“卫星”地区愈来愈穷，中心地区愈来愈富的趋势。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乃是当代落后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也不断向着贫富两极分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单一的结构，演变为贫——富两极结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4卷第333页）这种贫——富两极经济结构的产生，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具有某些新的特点。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它的前期，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是单向的，即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对本国的生产结构发生影响；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这种作用变为双向的了，即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不但在本国发生作用和影响，而且还直接作用和影响到“卫星”地区。就是说，这种作用会在世界的贫——富两极同时表现出来，促使穷——富两类国家的生产关系同时发生某些变化。由于贫——富两极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两极所产生的结果也极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发达国家那里，即在“拥有巨量财富”的那一极，推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不断自我扬弃。这种自

我扬弃过程，表现为从自由竞争到股份公司，再由股份公司到垄断组织，然后再到国家垄断以及跨国公司。资本生产方式这种自我扬弃过程，当然不是对自身的根本否定，而是对资本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以使生产关系暂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当然，这一过程是依靠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来实现的。帝国主义国家依靠它从殖民地半殖民地那里夺到的原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来改善自身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条件，给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活力，暂时缓和了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同时，他们从掠夺的财富中，分出一部分来腐蚀和分裂工人队伍，缓和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造成一种“社会和平”的景象，从而暂时推迟社会革命的爆发。但是，“文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落后国家“被压迫民族”那一极的作用，情况就大大不同了。首先，由于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帝国主义控制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命脉，使这些国家的原料和资金，大批地被“文明国家”直接夺走。其次，随着国外资本的入侵，破坏了落后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根本改变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使这些国家的生产，不再是面向本国市场，而是面向出口，即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送原料、消费品和半成品，另一方面又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制成品。由于资本主义的价格体系对制成品有利，因而在“平等贸易”的掩盖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被发达国家所攫取。再次，由于帝国主义是按自身的需要来塑造附属国，从而造成落后国家经济上的畸形发展，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偏重于发展原料和加工工业，缺乏设备和技术更新的条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经济上难于与“文明国家”竞争，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生产很难维持。同时，为了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生产相适应，落后国家虽也出现了一批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但这类企业多是服务于出口，故而集中于出口港岸，未能向其它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扩展，从而加剧了这些国家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也十分严重，整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新的生产力的扩张，使落后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条件日趋恶化，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堵死了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谋求发展的道路，使它们已有的资本关系不可能在正常条件下实现自身的扬弃，以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和其它社会矛盾大大激化。

现代生产力的这种双向作用，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本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应该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现在却被转嫁给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落后国家。应该表现在A极的冲突，现在却从B极表现出来；A极矛盾的相对缓和，却促使了B极矛盾的日益激化，这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特点，也是二十世纪多数年代里，发达国家一极保持相对稳定，被掠夺民族这一极却经常处于动荡之中的真正秘密所在。由于帝国主义转嫁矛盾，使被压迫的国家和地区，成为当代各种矛盾的焦点，引起了落后国家内部各种矛盾的剧烈冲突。这些矛盾，既然主要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引起，当然也只有挣脱资本主义的经济链条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故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生产方式的革命变革，必然先于发达国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不但不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背离；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的统一经济体系中，被掠夺民族的这一极也是比较脆弱的。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和转嫁矛盾的需要，自然不愿意被掠夺国家强大起来。因此，一方面为了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需要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这种经济充分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不允许这种经济脱离它们的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甚至为了便于控制，它们还需要在那里保存最落后的生产关系，扶植最反动的政治势力。因此，这种仰仗外力求得生存的畸形的经济形态，必然是不牢固的。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统一链条上，显露出了薄弱点，整个资本主义的防线，最容易从这里被攻破。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使经济落后国家内，产生了现代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从而使这些国家内出现了和资本主义同时代的先进生产力，为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所引起的变革首先从落后国家这一极开始，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正反映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帝国主义转嫁矛盾而得到的稳定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一旦失去了转嫁对象，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就会在帝国主义本土上恶性发作。因此，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甚至这些国家争得经济、政治上的相对独立，都会不同程度地打击着帝国主义的那一极。这是作用力必定要引起的一种反作用力。这种力量又会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觉醒。无产阶级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客观上已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总进程，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代；在现代条件下，将从被压迫民族的这一极开始，由帝国主义国家的那一极来完成。

(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只为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创造了客观的条件，要使这种更新变为现实，还离不开人的主观作用。

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发展的历史与自然发展的历史的区别时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因此，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决不是自发地、无意识地在社会的发展中起作用，它必须依赖人们去自觉地实现它。有的同志认为，当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时，自然地就会发生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在生产力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不乏其例的。在当代，一些落后国家先于经济发达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而另一些落后国家却并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同，但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这一切，都不能单纯地从客观经济条件中得到解释，而必须考察主观条件的发展程度。

那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需要哪些主观条件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要有实行这种社会变革的人和社会集团；这些人和社会集团已认识到进行这种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从而愿意实行这种变革；而且这些人和社会集团的变革意图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愿意为其努力奋斗；革命群众已获得了实行社会变革的物质手段，以便能够推倒反动阶级的统治。经济落后国家尽管社会矛盾激化程度大体相近，但这些主观条件却有很大差异，因此，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大工业在落后国家的扩张，使这些国家相应地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私有制的敌人，乃是摧毁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自然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创造更高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经济落后国家，虽然无产阶级在全国不占多数，但他们深受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特殊的憎恨，因此，他们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会毫不犹豫地奋起，与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殊死地斗争。同时，由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极，看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那一极的全部弊病，从而易于接受和掌握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易于学会先进的斗争方式和手段。所以，这些国家无产阶级虽然产生较晚，而一般地却觉悟较快，并在国内领导和联合人数众多的农民，形成一股改造旧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使社会主义最先在这些国家变为现实。

落后国家尽管有了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力量，但不同国家这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觉悟程度则很不相同。尽管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但担负改造社会的集团和阶级，如果尚不觉悟，尚未认识到变革社会的必然性，那么，仍旧不可能有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喷发出来。甚至就是有了革命群众的奋起，而尚无正确的路线和策略，那么这种变革仍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在那里仍旧不能成为现实，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会在那里保留着。一些国家在政治上独立后，仍继续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但作为人类历史长过程来说，那只是暂时的现象。

中国无产阶级虽然诞生较晚，但成熟、觉悟较快，它在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就在自己先锋队的领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迅速成长为自觉的阶级。他们联合起人数众多的农民和其它革命群众，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这场斗争中，我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已经把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对象，因此，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之后，他们就决不会再去给自己套上已经见到的、会给自己造成灾难的资本主义锁链。因此，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唯一可能的选择。

进行社会变革和改造，还要有实行这一改造的物质手段。这种物质手段，最初就是组织起来的革命群众自身。但是革命斗争的经验告诉人们，革命群众只组织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武装起来，才能推倒反动统治，实现自己革命的目的。因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必然会造成从这种制度获得利益的社会集团。如果要变革这种制度必然会碰到这些集团的反抗。而要打破其反抗，一般地说，必须依靠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作杠杆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保护这种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通

过武装斗争，建立了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这种政权当然不可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或其他经济制度之上。因此，这种政权一旦产生，它就不可能做出别的选择，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排斥其他发展道路。

人的主观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层建筑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旧的经济基础只有利用新的上层建筑才能摧毁和得到根本改造；而新的上层建筑一旦建立起来，它必然只维护与它相应的经济基础而排斥其它的经济关系。因此，上层建筑都具有排他性。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然只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排斥其他经济关系。我国通过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初期，面对着多种性质各不相同的经济关系，但上层建筑的排他性决定了这种情况决不会长久。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不必要，甚至认为建国后，应该首先去发展资本主义的论点，显然是一种不切实实际的幻想。

当然，上层建筑的这种排他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济基础所赋予的。因为一切上层建筑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要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这正表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但同时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又强烈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依据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与自己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阻碍和破坏与之不相对应的经济关系的发展。甚至可以说，一种经济形态的建立和另一经济形态的消亡，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上层建筑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也就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人类历史的进程正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迈向一个又一个新时代。

* * *

* * *

* * *

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已展现出这样的一幅图象：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心，逐渐向经济落后国家转移；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从落后国家破土动工，这绝非偶然，而是现代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产物。正是现代生产力作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世界分为两极，而又推动着两极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正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规律，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曲折和多样性的表现。那种认为落后国家先进入社会主义，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规律相龃龉的论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把具有丰富内容和革命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简单化抽象化的理解。用规律的一般性去剪裁生动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结果必然步入迷宫，得出十分错误的结论。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恰恰相反，正是这一理论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最好证明；正是这一理论的伟大胜利和发展。

国家、专政、民主、法制拾遗

范希夷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从各种角度上论述国家。从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列宁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定义的阐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一段：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就此列宁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忘记的言论’：无产阶级‘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0页）

这个“定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如果不曾被我们“忘记”的话，至少也是被忽略了。我认为在课堂上和文章中把这个定义和其它有关国家的论述齐头并论，就是忽略；如果片面强调某一命题，而不涉及这个定义，那就真正是忘记了。前一种情况显然不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准确认识，不利于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后一种情况则势必在论证与国家有关的问题时走向某种片面性。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是一句名言。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命题，是指本来意义上的国家——即剥削阶级国家说的。长期以来，有些文章引用这句名言，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描述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实际上是自觉地配合了阶级斗争扩大化。

“统治”和“压迫”，语义相近，但也并不是同义语。从上述“定义”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无产阶级国家简单归结为仅仅是阶级压迫机器。无产阶级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我们只有立足于这个最高概括的观点之上，才能更准确地认识无产阶级国家。当然剥削阶级国家本质上也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但是，应当看到，只有在那里，“统治”和“压迫”才是重合起来、同步发展的。

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统治不能不自始至终表现为阶级压迫。因为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的存在，就是以被剥削阶级的完整存在为前提的。而为了经济剥削就必

须进行政治压迫。所以这种国家就不能不以阶级压迫作为它的政治特征。尽管剥削阶级也往往还利用其国家机器把剥削压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也无非是便于把相应的剥削压迫制度延长下去。所以不论剥削压迫的程度如何，剥削阶级国家在性质上只能是剥削压迫的机器。剥削阶级国家无从摆脱阶级压迫的本性，因为这种国家无非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自身。这种国家的目的就是维持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它也必须有一个被剥削阶级的存在作为必要的补充。

可是，阶级压迫机器这个概念却不能完全而只是有条件地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虽然也不能不拥有暴力，并且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条件下或一定范围内，不能不行使暴力而发挥阶级压迫机器的作用，但是和剥削阶级国家相比，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不总是以剥削阶级的完整存在为前提的，无产阶级之需要国家和剥削阶级之需要国家不同，正是为了消灭阶级和消灭国家自身。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强化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不能忽略，无产阶级建立国家，正是历史上国家从产生到消亡的转折点。国家拥有暴力，或者说国家自身就是暴力。但是，一般地说，暴力并不等于暴力的行使，特殊地说，在无产阶级手里，暴力的使用是为了终极消灭暴力。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过程，又是从阶级压迫转化为消灭阶级压迫的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把无产阶级就其暴力性质和剥削阶级国家同等看待，就不免有简单化之嫌。

当然，在国家消亡以前的一个长时期内，它还不可能完全摆脱阶级压迫，但是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压迫对象只能是一定范围内剥削阶级残余及其影响的各式各样的反抗。尽管有时这种压迫还要依据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加强，而从这种阶级压迫的总趋势看来，国家的阶级压迫机能终究要退居次要地位，调节内部问题的机能会转化到主要地位。而这时决定国家本质的就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0页）列宁在谈到接近消亡时的国家说：“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2页）列宁说：“……没有什么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贯的阶级压迫机器。不能忘记，列宁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为“半国家”或“消亡中的国家。”至于国家什么时候“才没有什么可以镇压了”这之后国家还存在多久，那是另一回事。

应当像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既重视研究矛盾的普遍性，更重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历史上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除了它们的共性之外，还要重视它们的个性。笼统不加分析、全盘肯定地把历史上所有的国家都看作无非是阶级压迫机器，就会遇到如下一个问题：既然直到共产主义建成之日才是国家消亡之时，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必然是前后一贯地以阶级压迫为主要特征，那么国家的消亡实际上将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看作前后一贯的阶级压迫机器，就不免陷入一种错误的逻辑之中。这种错误的逻辑又会导致对专政、民主、法制等诸种与国家密切关

联的问题在解释上的片面性，从而导致实践上一系列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际以及每七、八年再搞一次的设想，除了其它原因而外，和上述对国家在解释上的片面性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固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曾再三再四地强调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压迫机器的性质。列宁甚至说过：“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期。”列宁的这些话本来是对的。巴黎公社的惨痛教训就是一个历史证明，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内战也证明了列宁的预见。但是对列宁这些话的理解不能采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态度。比如在我国阶级斗争的空前残酷、空前尖锐时期，就发生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政权以前，而不是以后。“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阶级斗争”虽然也十分残酷、十分尖锐，然而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不计在内。这里的关键是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时和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而不能生搬硬套，凭空臆想。

实际上在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联进入正常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列宁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观点，更完整更深刻了。列宁认为要“造成使资产阶级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不能单靠暴力，而是要靠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打倒、粉碎等等手段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

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的国家在现阶段阶级压迫的作用已经消失了，也不是说在短时期内阶级压迫作用就会消失。比如严惩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就是这样。但总有一天阶级压迫的作用将转到次要方面，调整社会关系、解决内部矛盾的作用将成为主要方面。而且这个转变关头实际上是早已经来到了。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

1、“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的“表述”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前节列宁所引用的《宣言》原文这里不再重引。但把列宁的阐述重引一下则是必要的。列宁说：“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这个思想的表述。”

在这里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述，并为列宁所明确强调指出的国家定义，则无产阶级国家既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正指的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讲过多次。这个统治，既要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又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这是“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阶级压迫，而是认为有更为丰富得多的政治内容。《宣言》问世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无产阶级专政又作过多次论述，除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一个重大修改而外，都是对专政的使

命、职能、方法手段以及专政所必然经历过程等等的重要补充。这些补充一向是围绕《宣言》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各种角度上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就足以说明这个专政在机制上的复杂性和内容上的丰富性。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一个从不同角度上包含着多种矛盾的统一体。

2、一个包含着多种矛盾的统一体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范畴，是一个从不同角度上包含着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从体制上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对立统一，而专政则包含着处理敌我问题和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对立统一、它的总任务和每一时期的阶段任务的对立统一、暴力和非暴力的对立统一、运用“资产阶级权利”和消灭“资产阶级权利”的对立统一；它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实体，和它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等等等等。如果进一步进行微观探索，还能够从这个复杂统一体的各个环节上发现难以数计的对立统一。

这些矛盾不断解决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巩固和发展、直到走向消亡的过程。如果把经典作家从各种角度上论述的精神联系起来，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漫长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依据客观规律和本阶级意志、凭借本阶级的国家机器、运用国家权力，组织本阶级并领导一切革命阶级、阶层，以最终消灭阶级、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为目的，而排除一切障碍、克服一切困难所采取的每一政治行为或其总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高度概括，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通俗点说，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借用《宪法》规定的法律条文说，这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样说是不是把民主和专政混为一谈了呢？这一点留在后面再说。

剥削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或人民的统治还有阶级斗争的任务。只是第一，它的对象已不可能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体系而存在；所以第二，这种斗争已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或人民运用自己的政权惩办这些剥削阶级残余的反抗。无产阶级统治越是强大，剥削阶级残余的反抗也就会越加微弱。无产阶级统治的强大，并不仅以暴力的强大为唯一标帜，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成熟程度，决定于无产阶级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水平。

3、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各个角度上所包含的矛盾中，专政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它的方式也是一分为二的。这始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对一个刚刚诞生、建国未久的无产阶级国家说来，它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它的核心是暴力和非暴力的关系。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很容易出问题的问题。

历史上任何一种阶级统治，都不能不以暴力为支柱，但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又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暴力。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说，就更是如此。